

從善如流制訂順應民意的預算案

黃宜弘 立法會議員

今年財政預算案發表之後，特區政府接納民意，作出了大幅的調整，決定「派錢」和退稅。調整後的預算案值得歡迎，預算案的確需要以應對通脹為主要的目標，兼顧社會民生和經濟多元化發展的需要。

財政司司長應在制訂預算案時適當加入一些內容，讓各政黨有機會提出修訂，然後政府擇善而從，推出改良的方案，共同化解社會的矛盾。用這個辦法，不但有助於各政黨「收貨」，亦會加強政府、政黨和議員的關係。

配合「十二五」強化區域合作

預算案深化粵港澳合作的措施，包括提升區域生態環境及基礎設施合作計劃應予支持。發展環保產業必須由政府牽頭，加強和鄰近地區的合作，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效。今年是國家「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特區政府應把握機遇，調整心態，放大眼光，積極配合，多為國家和本港做出一些擔當，包括充分利用國際化、市場化和服務業的領先優勢，考慮制訂及落實「香港五年發展策略」，設立與國家發展規劃相對應的架構，向中央政府建議將廣東推行CEPA服務業先行先試的成功經驗，擴展到長三角和海峽西岸經濟區；並加強與東亞區域的合作，仿效「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的模式，由香港工商界與東亞國家或地區在本港的工商界組成類似的機構。

落實有效措施應對通脹

去年以來，錯綜複雜的內外經濟環境，造成物價易升難跌。美國推行量化寬鬆政策，中東和北非局勢波動，日本地震後重建災區，導致熱錢氾濫，通脹加劇。人民幣升值，港幣貶值，樓市和租金上升，食品和交通加價。很多中下階層人士覺得，現在什麼都比以前貴了，貧困的人口多了，對於「通脹猛於虎」越來越擔憂了。通脹的問題，確實很難在短期內解決，將會是一個長期、持續、艱難的過程。特區政府應居安思危，善用盈餘，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增加對長者及弱勢群體的補貼，及早落實預算案針對通脹的措施，令備受通脹之苦的市民，可以減輕生活壓力。

大力支援中小企業拓展

眾所周知，中小企業是香港經濟和就業的重要支柱。預算案提出優化營商環境，推廣香港品牌，將「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的信貸保證承擔總額，由現時的200億元增加到300億元，為中小企業添置設備、擴大營運、拓展業務，提供更具廣泛、穩定並且具有彈性的支援。特區政府除了增加信貸額度之外，也應加強現行的各項中小企業資助計劃的宣傳力度，適當簡化相關的申請程式。長遠來說，更應協助中小企業加快升級轉型，打開內地市場，並考慮統一現行各項支援中小企業的基金計劃，以幫助中小企業持續健康發展。

俗語說，「眾口難調」。任何方案，尤其是財政預算案，出現贊成和反對的聲音，不足為奇。我覺得，一份有創意、有氣度的預算案，就要盡量做到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的平衡、長期與短期的平衡、各種不同利益之間的平衡。但政府的資源有限，而社會的需求無窮，要達至這三個平衡，試問談何容易呢？所以我希望，那些至今仍然不滿預算案的人，不妨考慮換一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與建制派議員會面後，宣布修訂預算案，包括「派錢」6000元及退稅。

個角度，反思一下如何能在各種需求中，找到平衡點，做到《基本法》規定的「量入為出、收支平衡」呢？

讓政黨有機會參與制訂預算案

特區政府雖然庫房盈餘，儲備豐厚，但應汲取西方國家放任理財、濫用預算、使政府面臨關門危機的教訓，確保財政穩健、可持續發展。香港回歸之後，未曾有預算案被議會全盤接受而通過。因此財政司在擬訂預算案時，要統籌兼顧，長遠規劃，預留一些空間；預算案公布後，要聽取民意，多與各方溝通，有時為了順應時勢，減少傷害，須果斷作出改變。因為各政黨須向市民負責，對於政府的方案，很難「照單全收」，否則市民會當他們沒去爭取。為此，財政司應考慮改變策略，在預算案中適當加入一些內容，讓各政黨有機會提出修訂，然後政府擇善而從，推出改良的方案，共同化解社會的矛盾。用這個辦法，不但有助於各政黨「收貨」，亦會加強政府、政黨和議員的關係。

其實，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問題，一向看得很清楚，很留意市民的整體和長遠的利益。今後特區政府、政黨和議員三個方面，如果能夠共同「立功」，那就更加理想了。至於香港未來的發展路向，中央領導人呼籲我們要注意三件事：即要有一個長遠的、科學的發展規劃，重視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努力改善民生。這三件事是中央對我們的祝福，也是對我們的期望。在我們努力實現的過程中，從香港實際的情況出發，上述的辦法應該是可取的。

激進派累死弱勢工人

蕭何

最近，不少50來歲的工人，都破口大罵李卓人「累到我有咩份工」，「激進路線害死工人」。在勞資問題上，李卓人提出的建議都是最激進的，要價是最高的，李卓人的動機就是以此來踩低工聯會，挑起勞資關係對立，唯恐天下不亂，乘機撈取選票。不過，任何社會對工資成本都有一個接受的極限。如果太高，就違反了經濟規律，最後使工人吃苦頭。香港工人對於李卓人早有認識，他們都說：「對於工人而言，飯碗是第一位的，如果沒有了飯碗，沒有職業，李卓人所謂爭取最高的工資，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對工人口惠而實不至。如果想有份份工，不妨跟着職工盟去竊。」

最近，最低工資立法，李卓人所挑起的有薪假期和飯鐘錢問題，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提高了這些收入之後，接下去，僱主就要支付積存金供款，如此一來，僱主就要增加幾成的工資支出。這是一次大躍進式的加薪，表面上工人得益，實際上許多中小企在財力上應付不了，唯有結

業。結業的結果，就是大批工人失業。那些年齡在50歲以上的工人，如果在這一波失業之後，相應的職位或行業（例如老人護理業）已經被淘汰，今後就難就業，變成了提早退休。所以不少工人說：「最低工資立法，我們未能享受得到，立即來了一個最高失業，我們都吃到苦頭了。」

趕絕中小企 工人受害

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與歐式的資本主義有不同的地方，香港的特點就是中小企佔了95%，工資制度相當靈活，這樣就提高了競爭力，鄰近地區沒有辦法提供的服務，香港都有辦法提供，所以香港的就業職位因此得到增加。如果用法律制度制定最低工資，第一個效應就是取消了香港的工資靈活優勢，許多行業將會在成本制約下被淘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許多老工人可以工作到六、七十歲，做一些打雜工作，不必領取津貼。包裝業、製衣

業、飲食業、送外賣、老人護理、大廈看更、零售店員、洗衣店，都提供了大量的老年人職位。不少家庭創業，經營小生意，都依靠這些弱勢勞工作為後備工源，拾遺補闕，整個社會的服務成本因此降低。

李卓人的好鬥性格，決定他先向中小企東主先扣上「無良僱主」的帽子，再進行殘酷鬥爭，迫使中小企答應接受過高的加薪要求。結果，把這些中小企送上了絕路，製造了一波關門浪潮。最後，香港的就業環境惡化，年紀比較大、動作比較緩慢的僱員立即在勞動市場被淘汰，失去了就業的機會。所以，弱勢的工人都批評李卓人無事生非，損人不利己，指出「最低工資本來就沒有規定有薪假期和飯鐘錢的細節，讓中小企有一個喘氣迴旋空間，這是最好的安排。現在李卓人在立法之後，上床掀被，燒起這個火頭，表面上是為工人爭取利益，實際上是打爛我們的飯碗，害死了我們」。激進派，灑向人間都是怨，可見一斑。

從屠房員工爭取加薪看工會發展空間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會副會長

近年所見，有關勞資雙方發生糾紛或商議加薪的問題上，行業工會和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往往起到重要作用，是工會爭取員工入會的最佳機會，為勞工界提高知名度和支持率。這也是工會擴大生存和持續發展的空間的途徑。

近日水屠房員工爭取加薪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為爭取加薪，員工與資方經過多月來的爭論，陷於僵持，到最後員工邀請工會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出面」，參與談判，最終達成加薪方案，定於五月一日生效，加薪比率約達15%，比當初資方開出來的5%-8%高出一倍有多，有點大出員工意料之外。當然，能夠達到如此加薪幅度，也與資方出於對基層勞工的關顧作出讓步有莫大關係。

除了員工得到「甜頭」之外，工會亦得益匪淺。因為得到工會和業僱明議員的全力支持和斡旋，令許多員工都自願加入工會，新增會員人數接近工會兩年來發展人數的一半。未出現這次加薪事件之前，工人對工會認識不多，經此一役，工人看到工會及業僱員落力和著緊爭取加薪，令屠房員工大為感動，紛紛表示參加工會，工會有助大家齊心一致，日後有勞資糾紛問題就容易解決。

隨着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各種政治團體的出現，又有民選兩級議員，再加上政府資助設立許多地區社會福利機構，提供各式各樣的支援服務，對工會產生較大的衝擊和影響。令過去有事向工會求助變成有事轉去搵議員、政黨、區議員或福利署社工，有

點取代了工會的角色，工會有被邊緣和淡化的趨勢。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形勢下，作為勞工階層的行業工會還有發展的空間嗎？還有吸引力和影響力嗎？還能發揮作用和能量嗎？這必然是許多工運前輩和目前仍堅持從事工會工作人士值得探討和面臨考驗的問題。

香港目前擁有400多萬各行各業的勞工，然參加工會的人數約莫只有40多萬，佔整個勞工階層人數不過1/10。亦即是說約有300多萬勞工人士沒有參加工會，這與西方一些工業國家的工會人數不成比例。緣何勞工階層人士不願參加工會，成因很多，其中包括上述所列政黨、議員和社福機構不斷冒起有關之外，也少不了工會自身的問題，包括資源、自願人士和文化水平。

如何發展工人入工會、壯大力量，要有新思維和變革，要與時俱進，改變過去老式的教條和做法，爭取主動多做實事和切切實實關注勞工切身權益。屠房員工加薪事件之所以一下子能吸引許多員工加入工會，就是因為感受到工會和議員為他們爭取權益，受感動而入會的。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生豬行工會近年成立一個互助社，加強超市和街市肉枱員工互通訊息，互相介紹兼職及替工，深受行家歡迎，紛紛參加互助社，以便找到工作，互助社不斷壯大，人數不斷增加。為什麼會有這種顯著效果，就是關乎工人的切身權益。由此看來，香港的工會還是大有發展空間。

為什麼永遠是中國？

部分西方媒體的「中國綜合症」

鄭若麟 資深傳媒人

在西方國家任何領域一旦出現涉外的某類問題，無論是電腦黑客、或是雷諾汽車間諜案都與「中國」有關！儘管官方都沒有指定任何特定國家為懷疑對象，但媒體報道的形式，均使其民眾得到「中國是罪魁禍首」的強烈印象。其中反映出來的某種潛意識裡的定向思維，實乃耐人尋味。

日前澳大利亞傳來消息，澳大利亞《每日電訊報》報道，澳大利亞國會高官員使用的電腦遭到黑客入侵，包括總理吉拉德、國防部長史密斯、外長陸克文在內的十多名政府高官的數千份電郵有可能被非法下載。據說這一消息還是美國情報機構透露的！該國媒體廣泛引用一名匿名的政府官員消息稱，這次非法黑腦入侵事件從2月份就已經開始，迄今為止已經持續一個多月；媒體還引用來自「官方」的消息稱，根據從四個來源的情報依據，中國被列為懷疑對象之一。

無獨有偶，法國財政部不久前亦揭露，該部近兩個月來遭到「大規模網絡攻擊」，至少150台電腦被一種「木馬病毒」感染，大量資料被非法下載。誰是始作俑者，財政部表示「不知」。但法國部分媒體已經找到「罪犯」：當然是「中國」，就如著名記者達尼埃爾·施納德曼在一篇博文中所諷諷的那樣：「不用找了，永遠都是中國……」

西方媒體蓄意將污水潑向中國

然而全球專家們都很清楚，在網絡戰中，誰是入侵者、甚至誰是真正的受害者，到目前為止從技術上來說很難抓住「現行犯」。受害者往往因缺乏足夠證據而無法將指責的矛頭對準某個國家或某個組織，甚至某個黑客個人。儘管據《巴黎競賽畫報》引用匿名人士（如澳大利亞一樣）的「消息透露」，下載的數據有一部分是被輸往位於中國的服務器。但因為真正的黑客往往躲在其他國家的服務器背後，因此匿名消息透露者亦表示，「不能據此而指責中國」。更何況，如澳大利亞一樣，法國政府發言人、預算部長巴胡安代表官方已經明確聲明，法國掌握的情況不足以指責任何特定國家。然而從事件被披露的一開始，如澳大利亞一樣，部分法國媒體就不分青紅皂白，蓄意將污水潑向中國。

應該看到，這種現象在西方國家部分媒體上並不罕見。早在2007年德國《明鏡》周刊就曾大肆報道過「中國黑客」問題。美國《華盛頓時報》也曾公開指責中國人民解放軍對美國發動「網戰」。其他西方國家也都或多或少曾出現過類似的無端指控，而且最終都被證明是子虛烏有的。但需要問一聲的是，為什麼這種現象會屢屢出現？3月29日又加上了澳大利亞類似的指控。無論最終調查結果如何，在媒體上，在公眾輿論上，罪犯已經有了，當然是：「中國」！

冷戰思維導致「中國綜合症」

首先是對中國的強烈偏見所致。這種偏見存在於很多西方國家的主流媒體上。如去年初美國包括谷歌在內的33個組織和公司的網絡遭到攻擊，美國媒體立即將矛頭對準中國，儘管統計證明，在美國每年發生的數以千計的網絡攻擊中絕大多數都是美國人自己的「傑作」。一些記者甚至承認，一讀到這類消息，首先想到的確實就是中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已經變成一種本能。顯然，這種「本能」源於冷戰思維，因為中國是個「另類國家」。這一事實使得中國日益成為網絡戰的「替罪羊」。

其次就是從這種冷戰思維延伸出來的「政治正確主義」。世界上有能力進行網絡戰的國家首屈一指的是美國和其他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其次才是中、俄、印等國，為什麼單挑中國？指責中國是網絡黑手，符合目前西方輿論中將中國視為「黑手」的「政治正確」範疇。在這些媒體看來，中國代表着他們所時時刻刻在尋找之中的「惡」（因為他們自身代表着「善」），所以一旦出現網絡攻擊、出現間諜案、出現其他種種國家之間的摩擦或衝突，首先就是「中國錯」。必須清醒認識到的是，這種「政治正確主義」已經達到這樣一種程度，使得法國主流媒體已經不敢為中國進行辯護。這樣的前景是非常危險的。

第三個原因，就是攻擊中國沒有任何風險。中國寬容的「泱泱大國」風度，已經被視為某種「理虧心虛」的表現。多少辱華案最終都是不了了之。試試攻擊一下其他國家，看看會有什麼結果？法國總統薩科齊將「墨西哥文化年」「奉獻給」一位在墨西哥被判60年刑的法國女子（因為法國認定該女子是被冤屈的），墨西哥的回答是：取消文化年！但媒體攻擊中國，則不僅沒有任何風險，相反還可以提高銷售量。

幸虧法國還有具正義感的記者和網友，他們正在越來越深入地瞭解中國的實情，正在幫助中國「正名」。在這次法國財政部網絡攻擊事件中，就有很多網民指出，實施攻擊的「黑客」最有可能是某個反G20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行為。但媒體在沒有證據在手的情況下不敢指責這個組織的。但在沒有證據在手的情況下指責中國，則沒有太大問題……這一點，再加上冷戰思維和政治正確主義，也許就是西方部分媒體的「中國綜合症」的由來。

核洩漏嚴重影響香港食物安全

李華明 立法會議員

明辨是非

日本9級大地震已經接近1個月，除了災區居民天天受苦，盼望救援外，世人還在注視福島核電廠的核洩漏危機。放射性物質不斷釋出，不止影響週邊生態，最令筆者憂心的，是這些物質已經流入了大海，即使專家們如何解釋核放射物質入海後會稀釋，但當放射核物質源源不絕數以萬噸計流進太平洋，實在難安世人心，如果這些物質進入了食物鏈內，受影響的是全球人類。

日本雖遠實近，與我們只是一海之隔，況且日本和香港的交往非常密切，日本食品，無論是預先包裝食品還是漁農水產，都深受消費者歡迎，日本食店成行成市，但一場核風暴，已將他們的生意吹得七零八落。日本農作物、動物和海洋生物受到多少影響，要由專家評斷，但是這些輻射物的衰減期以數十年甚至千年計，可以斷言已經嚴重影響環境。

特區政府日前已宣佈禁止日本五個縣的預先包裝食品進口，當中包括蔬果、肉類。而一些魚類

則有日本方面低於輻射量的證明，就被豁免入口。但消息傳來，印度已率先成為第一個全面禁止日本任何食物進口的國家，維持3個月。印度的做法，是相當「激進」，但是對其國民而言，卻是最保險的做法。特區政府日後是否需要擴大禁止入口的規模，要留待官員處理。不過，筆者最關心的是放射性物質在食物中容許量的標準，各個國家和地區在這方面都有差異，而日本的標準較香港的寬鬆很多，核電廠危機消除後，不等於被污染的食品即刻無事。因為標準的差異，日後可能會有更多受核洩漏污染的食品從日本出口至香港，食物安全中心應該立即制訂措施，調整工作次序，長期和重點監測來自日本的所有食品，包括蔬果、肉類、海產、乾貨、飲品、罐頭以至小食等等，並檢討是否需要收緊現時放射性物質在食物中的指引限值，確保進口的食物並不影響健康。

看來，周一嶽局長今年的最大挑戰，是要確保進口的食物不會受到輻射的污染。而對整個特區政府而言，對付核污染，更可能是數以年計的持久戰。